

無奈的表演： 土地改革中的知識份子

• 王 英

摘要：本文將文化人類學的視角和方法引入歷史研究，考察新中國初期土地改革運動中知識份子的思想、情感和具體應對方式，力圖描摹一個複雜多元、眾聲喧嘩的圖景。通過文本和田野資料的梳理，本文發現，身份背景各異的知識份子參加土改，完成了基本的土改流程，他們扮演了宣傳者、意義的解釋者、教育者、被改造者等多重角色。土改中的知識份子情感十分複雜：對政權的真誠支持、小心翼翼的自保、一知半解的配合、救贖原罪的渴望、乘機升遷的權謀等。知識份子在行動上和言論上對土改的支持，共同演繹了一場政治儀式。他們的實踐和文本不但成為政權合法性的一個來源，也構建了獨特的公共正義的想像。從整體上看，新政權的政治倫理和意識形態走向了公共展示，通過儀式和表演來進行教化，通過符號展示來達致集體想像，形成一種獨特的「劇場政治」。知識份子是這一劇場政治的一部分，參與了這一特殊政治體制的構建過程。

關鍵詞：知識份子 土地改革 劇場政治 政治儀式 黨國政治體制

1950年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改革（以下簡稱土改），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深刻的社會經濟變革之一，也是建國初期中共整合社會，獲得政權合法性的重要事件。對這一歷史過程，學界已經有了較為充分的研究^①。一些學者借鑒社會學理論，對土改做出全新解釋。比如黃宗智借用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象徵資本」的概念，分析了農村土改中的客觀性現實和表達性現實之間的區別^②。張小軍也深受布迪厄的影響，分析福建陽村土改中的階級劃分是一種象徵資本的運用^③。近年來又有一些學者在「把國家帶回來」的潮流

* 本文的修改得到了《二十一世紀》兩名匿名評審專家非常中肯的批評和建議，特此致謝。

下，強調土改中的暴力成份^④。這些理論和經驗都豐富了我們對此段歷史的認識，但現有研究對土改中的一個特殊人群——知識份子著墨不多，並未將知識份子當作一個獨特的社會類型來研究，也缺乏深入分析。

本文把文化人類學的視角和方法引入歷史研究，特別關注在這場深刻歷史變革中知識份子的思想、情感和具體應對方式，試圖通過深入訪談重建歷史田野，在交流中捕捉列維-施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所說的「一件一閃即逝的小插曲，一片風景的片面，或是一句偶然旁聽到的話」，因為這些細節「可能就是了解以及解釋整個區域的關鍵所在」^⑤。本文通過重構歷史無聲者的聲音，以下層的眼光重新反省革命^⑥，同時，本文特別注重將報刊、日記、傳記等文獻材料和口述材料結合起來，互相參照，對比分析，重新恢復歷史情境，分析具體場景中人們的心態和行為，思考以下一些問題：知識份子如何介入了土改？做了甚麼具體的工作？扮演的角色是甚麼？他們怎樣面對並理解暴力？如何理解他們在公共報刊上發表的一系列支持土改的文章？如何理解知識份子和政黨國家之間的權力關係？要回答這些問題，必須重建歷史文本；更重要的是，需要在一個全新視角下解釋歷史，因此必須拋開固有的政治偏見，從人性的高度來分析解讀土改中的知識份子，並重新思考1949年之後的黨國體制。

一 土改：解放之旅

本文的第一個個案來自田野調查中的深入訪談資料^⑦。劉玉芬是1950年被招募進入革命大學，然後參加土改運動的一個典型。中共接管北平不久，各個部門大量欠缺人員，因此共產黨決定從社會上吸收有一定知識和文化的人，為新管理部門培育人才，同時辦了很多革命大學、培訓班和軍政學校，教育他們成為「革命新人」^⑧。劉母從私立學校辭了工作，帶着女兒一起去參加了當時在西苑的革大(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她們母女在革大學習了六個月，每星期主要靠吃白菜湯和玉米麵饅頭，住在大通鋪的集體宿舍。黨免去了她們的食宿費用，每月還有一定生活補貼，這對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整日提心吊膽的她們來說，生活已是天翻地覆。她們精神振奮，積極學習，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塑造無產階級價值觀和人生觀，決定做一個對新社會有用的人^⑨：

那時候，我們生活雖然比較艱苦，但精神卻前所未有的興奮鼓舞，我們母女一起學習讀書。在學校裏主要學習《社會發展史》、《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唯物主義論》，還有其他一些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很多學生一起上課，我記得當時我們的老師有些還是著名學者呢，范文瀾就曾經是為我們講授中國社會發展史的老師。

革大是劉玉芬開始接受共產主義教育的場所。但是，真正把書本知識融入具體實踐，用革命理論指導實踐，卻是她離開革大，參加土改的「解放之

旅」。劉從革大畢業後，被分配到了一野十八兵團的文工團，日常的工作主要是宣傳黨的政策。不久，文工團組織了一個隊，在黨組織的安排之下，南下到川北新解放區參加土改。前往川北的旅途雖然艱辛，但是劉回憶起來卻非常驕傲^⑩：

我們去川北主要是靠步行，背着一個包袱，簡單拿幾件衣服就走了，那時候沒有好鞋子，一雙軍用鞋，走得腳底下都磨了泡。我們的食物簡單，行軍勞累，但是大家普遍情緒和精神都很高昂。我因為在文工團學會了戲劇表演和演唱，一路上都給大家唱《繡金匾》，或者演出《白毛女》。尤其是演出《白毛女》，後來也在川北宣傳土改的時候，也不斷地給當地的百姓演出，向人們傳達地主怎麼殘酷地欺凌和侮辱勞動人民的信息，很多人看了都很感動，有些婦女看了《白毛女》都哭了。

川北是國民黨的老巢，還有很多殘餘武裝力量需要肅清。國民黨殘餘部隊和地方惡霸土匪結合在一起，成為不可小視的敵對勢力，所以清匪反霸是當時中共的首要任務。如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等人指出，中共最初向農村的滲透以解放軍部隊的形式出現，從城市向農村集鎮，然後向村莊展開。這些部隊的工作除了剿匪外，一般限於收繳當地民眾的武器、執行治安任務和組織民兵^⑪。這些年輕的、有一定文化和技能，剛剛接受過思想教育和培訓的知識份子，首先要協助部隊剿匪。劉玉芬恰恰懂得四川話，就做了當時一位黨員書記的翻譯，跟在他的身邊，了解情況，和地方人士溝通，也向當地人進行革命宣傳和教育。在她的記憶裏，有一次非常勇敢的冒險經歷，至今回憶起來都略帶驕傲——一個十九歲的女孩，操着不甚熟練的川北方言，去勸說一個當地的土匪頭子不要和人民為敵，改過自新。清匪反霸的最後一個環節是槍斃土匪，這是劉在半個多世紀之後依然不能忘懷的景象^⑫：

行刑和槍斃那一天，天氣似乎非常的陰沉，我們是由川北黨委書記和川北政治部主任帶隊，行刑場外有很多圍觀的群眾。當時鎮壓惡霸土匪是由部隊戰士專門組成的行刑隊，但是臨時行刑隊的人手不夠，和我們同來的一個年輕的文工團宣傳員，自告奮勇地充當射擊手。那天我非常緊張，那是我第一次在現場看到槍斃的場景，一直都冒冷汗。和我一起來的那個朋友，就是去做射擊手的那個年輕的宣傳員，手發抖得厲害，那是他第一次開槍，怎麼都拿不穩，連發了好幾槍，全都放空了。我還記得那一天，那個他瞄準槍斃的土匪回頭看了他一眼，眼裏充滿了恐懼和祈求，他就怎麼也無法打那一槍。後來，旁邊的行刑隊隊員接替了他的位置，開了兩槍，一槍正中心臟，另一槍正中後腦。

清匪反霸完成後，劉玉芬轉向了另外一個村子參加土改。她們文工團的一個團長是參加過解放四川的老共產黨員。進入村子的第一件事情是調查當

地各家的經濟狀況，劉從當年的地下黨組織那裏得到了很多村子基本情況的記錄報告，造成小冊子，對每一家都大體有了了解。接着去做的事情是訪貧問苦，她也是第一次看到鄉村裏的窮人生活得那樣艱苦，比自己想像中的要差得多，她回憶自己當時的感受說^⑭：

那時候我走訪了村子裏最窮的一家，家裏沒有牀，沒有被褥，只有一個老頭，一個人住在一個搖穀子的筐籠裏，蓋着破舊的棉花套子，破舊的棉花用線網住，都變成一條一條的。我被這種情形徹底地震動了，你知道我是出身於城市貧民，家裏在解放前也是揭不開鍋的窮困，但是在我出生成長的北京，從來沒有看到過農民窮困到如此程度。於是我一直啟發和動員這個老人去訴苦。我一點點耐心地啟發，對他說，你看，你給地主幹了一輩子，你爹也給地主幹了一輩子，現在卻甚麼也沒有，你看你現在生活那麼窮，不是因為你不努力，是地主的剝削，這種剝削是不公正的。你應該站出來，把地主欺負你的罪行都說出來。你看他們家甚麼都有，你到現在還是一個人，連老婆都娶不起，不是地主欺壓的結果嗎？

劉玉芬用她自己在革大培訓班或者文工團學習的話來啟發這個全村最窮困的老頭，最終這個老頭被她說服，參加了訴苦大會。她還說服了其他一些人，好幾個月的時間，一點點地問，一點點地做他們的工作，因為要動員群眾起來，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⑮：

剛開始的時候這些人很難動員，沒有人願意站出來發言，有人怕地主會報復，有人覺得地主挺好的，不願意批鬥他們。我好幾個月的時間，全都用來不斷地說服教育、一點點地找人聊天，後來才漸漸地動員了一些人發言。

訴苦大會之後，挑選一些「罪大惡極」的典型份子召開公審大會。下一個階段裏，工作隊就做一些很常規的事情，丈量土地，計算土地，造冊子。劉玉芬也懂得算術，計算誰應該得到多少土地，地該是怎麼分法。分了地以後，緊跟着分浮財，房子、糧食、農具、衣服，還有錢，這些財產都要上報；工作隊仔細審查計算後，再一分給貧僱農。看到窮苦的人有衣服、糧食、房子，也有了自己的土地和生產工具，劉覺得這麼久的辛苦沒有白費。對她來說，清除那些壓迫窮苦人民的地主惡霸，是一件正當而合乎道義的事情，所以對後來的槍斃和行刑，也就沒有剛開始接觸時那麼害怕了^⑯：

最後是槍斃地主，但是十個地主裏面，只槍斃裏面罪大惡極的。我記得我在的那個村子槍斃了四五個。其他的人陪綁，一大批人跪在那裏陪綁。我已經沒有清匪反霸的時候那麼緊張，新的時代到來，新的政權建

設，舊的壓迫者應該是這樣被懲罰的。離開川北的時候，我是期待着農民將過上新的生活，期待着自己所做的一切能為他們帶來全面的解放，為農民和鄉村的發展帶來希望。我一直相信自己做的是對的。

如果說剛開始面對直觀而赤裸的暴力，劉玉芬還有些害怕驚慌，隨着土改的深入，幫助窮人翻身的道德正義感，逐漸壓倒了原有的恐慌。在她的回憶裏，有兩種情緒一直激蕩其中：一種是對於直接暴力的驚駭，多年來她甚至在夢中都還見到那些場景，念念不忘槍斃行刑的暴力情形；另一種是完全的道德正義感，幫助窮人的自豪，情緒上的亢奮和激動，對自己所做的一切是「正確」的一種近乎宗教般的虔信。具有弔詭色彩的是，暴力直接的展演反而強化了她對國家和黨的合法性和正義性的認識，國家鎮壓了「壞人」反證了其存在的無可置疑的合法性。

對於人類學家來說，人的行為都是帶着特定意義符號的象徵行為，人們不應把社會看成一部結構複雜的機器，而應該把它看作一場解說人生和世界的戲劇^⑥。劉玉芬在土改儀式中扮演一個獨特角色，從進入革大學習理論知識，到具體介入土改宣傳政策，再到面對赤裸的暴力，完成具體動員農民訴苦和分配土地的工作，她的心路歷程，是建國初期很多知識份子的一個縮影。她所做的一切，都是歷史河流中的一部分，卻也不得不對人生中經歷的一切做出解說：剝削—解放的邏輯正是這一戲劇的解釋模式，也是她理解和闡述人生意義的一個重要圖標，通過這一意義解說，個體人生和宏觀歷史潮流纏繞編織在一起，時代精神成為個體生命的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戲劇的解說即是歷史，也是人生。對許多像她這樣的知識份子來說，土改運動中的暴力，只是宏大解放故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並非單純權力的震懾，更重要的是作為一種儀式、一種展演、一種象徵，在驚恐中夾雜着集體正義的想像，並帶有強烈的道德主義的激情。

二 土改實踐與多樣人生

在劉玉芬的個案之後，以下試圖結合田野訪談、日記、回憶錄等文獻材料，描繪土改實踐中知識份子複雜的多元心態。對於不同的知識份子而言，參加土改實踐的初衷、心態、積極表現的理由，以及具體應對方式可能呈現出很大差別。

1949年之前，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基本上過着平靜的學者生活。他曾寫下這樣的話：「其驤十五以前渾渾噩噩，十六十七獻身革命，十八而志於學，從今而後，矢志不移。」^⑦譚多年一直信守自己的承諾，在書齋中兢兢業業，較少過問政治。和所有正直的知識份子一樣，他同情左派學生和民主運動，反對國民黨鎮壓。面對日益腐敗的國民黨，譚和大部分的知識份子一樣，相信不管甚麼黨來掌權，都比國民黨要好得多^⑧。1949年，譚只有

三十八歲，他和浙江大學歷史系教員認真地參加了一年的政治學習，學習蘇聯版本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還有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等論著。那時候，閱讀研究還能比較自由地討論和辯駁，這是他對馬列主義著作閱讀最透徹的時期^{①9}。

真正的第一場政治考驗是譚其驥1951年到復旦大學任教之後才開始的。1951年的深秋，他和復旦歷史系師生一起參加了安徽的土改^{②0}。安徽省五河縣和靈璧縣是淮北的偏僻貧瘠之地，復旦師生出發是在10月27日。譚剛到五河縣喬集村不久，就去開工作隊大會，進行土改的動員和準備工作，向村民宣傳土改的政策和國家的方針路線。他在10月30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②1}：

下午村北學校後殿(原為玉皇閣)開全鄉村組幹部會，陶推余作報告，說明來意，表明態度，解釋土改之正義性，必需性，總路線，總政策，並與治淮、貸糧、種麥菜結合。晚開村民大會(街上)，黑暗中作土改政策宣傳，亦與治淮等問題結合，打通群眾思想，解除顧慮。

此後，譚其驥完成了參加土改的基本流程：接見貧僱農、聽訴苦會、選舉農會、分配土地等。我們通讀《譚其驥日記》，會發現這位昔日燕京大學的高材生，對於土改是一場政治考驗心知肚明。他的同事陳守實也在思想改造報告中講到，土改只是一個業務，自己可以不去，去了不守紀律就回來^{②2}。同在復旦工作的潘恪基講到，參加土改的動機是想看看沒有到過的地方，看看究竟怎麼回事^{②3}。對這些生活平穩的學者來說，這場旅程只不過是人生中的一個片斷，必須要應對的一個考驗，不需要太過認真；而政治不過是生活中一項額外的任務，完成之後還要回到平靜的書齋，回到自己的專業研究中。

但是，組成土改工作隊的復旦青年學生，卻有着完全不同的心態。筆者所訪問的古小娟，1951年正在復旦中文系讀書，也報名參加土改，她回憶道^{②4}：

我們當時剛讀大學不久，都很年輕和單純，對走出去工作充滿好奇，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好好鍛煉一下，大家都想為新社會鬥爭出一分力氣。很多同學都很積極，大家也把這次土改看作大展身手的一個機會。

古小娟是復旦高材生，她和同學懷着青年人的熱誠，想在土改中「大展身手」，積極表現自己。許多年輕學生都明白這一點：在這場政治運動中表現良好，會成為未來履歷上的「光榮一筆」，為來日的晉升和光明前途打下良好基礎。顧頡剛在他的日記中便記載了這樣一類土改中專事積極「帶頭作用」的年輕學子：那些帶頭的學生幹部簽名參加土改之後，即又退出，為其他工作帶頭，如火車頭將列車拉到一地，車頭隨即退歸^{②5}。

古小娟和她的朋友這些天之驕子(名校高材生)，對新時代有很強的參與感，更想有一番積極作為，對在新社會贏得榮譽、地位更為敏感。另外一些

出身較為低微的年輕學生，他們跟隨着時代的步伐，更多是為了謀取生存。陝西的蔡恩勝因父親嗜賭把財產輸光，於是參加軍政大學，找個謀生的好出路^②：

我想參加軍政大學可以分配個好工作，我也不懂甚麼主義，雖然整天學習開會，也搞不懂那些道理，甚麼理想，混日子唄，很多人跟我差不多，大家都是謀個差事。後來我們被編成隊伍參加土地改革，我也就跟着去了，也沒想甚麼，反正跟着混日子唄。

還有另外一類年輕的讀書人，帶有沉重的出身原罪，參加土改正是洗刷自己原罪的一個機會，也是在新社會重新做人的一個途徑。筆者所訪問的世家中醫尤恩便有這一經歷，其背後蘊藏着更沉重的綿綿不斷的世態炎涼和人間恩仇^③：

我父親是國民黨軍官，西安解放的時候，他負責長安這一片的防務，是這裏最高的地方軍事長官。他是主動投降的，但1950年以後，他就再也不從政了，他懂得醫術，就在老家開了個中藥診所行醫。因為有那一段經歷，我們家一點都不敢張揚，總怕被人看不起，總怕有人找麻煩。我去參加土改，想爭一口氣，也想讓我父親不受人欺負。

作家野夫在他的回憶錄《鄉關何處：故鄉·故人·故事》中記載了一個類似的故事，只不過更顯得悲涼^④：

武漢次年（1949年——作者註）易幟，革命大學招生，母親投考，結業後竟又鬼使神差地被分往恩施剿匪土改——踏上她父親送命的路途。在這條充滿險惡的山路上，她與我父親邂逅相逢。一個平原遭遺棄的將門孤女，一個山中破落的土司遺孀，在那個偉大動蕩的時代，偶然又必然地結合了，並從此扎根深山。

野夫並沒有在父母親土改的故事上作太多停留，也沒有提供更多細節，但其間的世事亂離、家仇國恨則撲面而來。將門孤女和土司遺孀險惡的路途，必將不同於劉玉芬那充滿正義想像的旅程，也不會如復旦那些年輕雀躍學子的人生；他們的聲音隱沒在偉大時代的旋律背後，後人也只能分辨出絲絲細微的音符。

如果土改是一個魔幻現實主義的大劇場，每一個人都難以置身事外，那麼知識份子和其他社會群體就是這個舞台中的演員。隨着政治轉變為一種日常生活的行為藝術，每個人介入的背景和心態可能差異巨大，但卻做了幾乎同樣的事情，政治活動因循同樣的腳本和台詞展開。當然，筆者在前面所說的展示和演出，並不表示每個人都清楚這是一齣戲，而進行理性的、有意識的演出；真實和虛假並沒有明顯的邊界，這只是一種情景，一種權力運行的

模式。當代中國的人們生活在這樣的氛圍中，並對自己生命的存在方式和意義給出闡釋。

三 文本：表述與象徵

土改是對知識份子的一場考驗，無論是學院中的著名學者還是青年學子，也無論身份地位的高低，都必須學習參與實踐，並且論證土改的正義性，這是一種表達的政治，充滿德性教化的象徵色彩。如果說土改是一場權力和道德正義的展示儀式，那麼知識份子書寫的文本則是這個儀式的重要組成部分。格爾茲 (Clifford Geertz) 在討論儀式和符號的作用時指出，國家須從想像性能量和符號潛能中吸取力量²⁹，公開發表的文本正是重要的符號和象徵，就像一首樂曲的華彩、一場彌撒的懺悔一樣，不可或缺。這些公開發表的文字渲染階級壓迫和封建統治的不公，表達對勞動人民的同情、對黨偉大領導的讚頌，文本和現實交織在一起，構建了一種狂歡的氛圍、一種儀式性的程序、一個戲劇性權力展示的空間。因此，知識份子書寫的文本材料也成為文化人類學分析的一個重要資源。

1950年1月27日，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馮友蘭在發表了自我批評〈一年學習的總結〉五天之後，第一個報名參加了京郊土改。他和夫人任載坤，先到豐台西北的張儀村，後轉到盧溝橋鎮，參加了一個半月的土改。後來在清華學生主辦的大字報上，馮曾專文談及了自己參加土改的動機。他認為參加土改有三大原因：一、封建土地所有制度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物質基礎，不摧毀它，便不能使中國社會變質，參加這使社會變質的工作是難得的機會；二、取得一點革命經驗，以充實從書本上得到的知識；三、參加土改，在客觀方面與地主鬥爭，在主觀方面也就是與自己潛在的地主階級感情鬥爭，如是可加速自己的進步³⁰。馮後來自述³¹：

我們去沒收地主財產的時候，還是有一個武裝同志戴着武器在前面開路，工作組人員和農民群眾跟在後面，成為一支很雄壯的隊伍，這是武裝革命的象徵。沒收地主的財產，把他們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給農民，這是中國歷史中歷代農民起義的最高理想，可是向來沒有實現過。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工農聯盟的條件下，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民群眾武裝起義，才能實現這個理想。當時我們的隊伍，就是實現這個理想的最後一個階段的象徵。

在當時的環境下，知識份子必須像馮友蘭一樣，心悅誠服認同土改的象徵意義和理想，或者至少表現認同土改的合理性，從而強化社會對土改的認同。他們應用階級分析的話語系統時甚至比中共幹部還要嫻熟。歷史學者施文淇在《新觀察》中迅速表態：大多數地主不甘心自己階級的滅亡，絕不甘心將他們剝削來的果實雙手交還給農民。儘管土改的政策對地主階級是比過去

寬大得多，但地主階級中仍有許多人在反抗政府法令和土改的進行。以蘇南土改來說，就是一系列激烈的，包括理論的、政治的、經濟的對地主階級進行反封建的階級鬥爭過程。它一方面表現在農民迫切需要翻身和獲得土地，要起來摧毀幾千年來壓在他們頭上的封建統治；另一方面地主階級卻用盡種種方法，或明或暗地對土改進行破壞，試圖維護他們的利益和有利於他們的封建剝削制度^⑳。著名社會學家、時任清華社會學系教授吳景超在《光明日報》發表了他的檢討文章^㉑：

在解放以後，我們也學過階級觀點和群眾觀點，但兩年的學習，其所得似不如一個月的實踐為深刻……土改的第一步，就是要組織廣大的反封建統一戰線，與地主階級鬥爭，在此時，鄉村中的每一個農民的立場不能模糊，在兩個陣營裏，你是站在哪一邊？你是擁護誰，反對誰？這些問題，每個人都要作出一個決定性的答案……在學校的環境中，沒有尖銳的階級鬥爭，沒有熱烈的群眾運動，想在這樣的環境中獲得階級觀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熱烈的群眾運動以及尖銳的階級鬥爭，成為教育知識份子的最好場景。實際鬥爭中帶來的情感和思想變化，比學習理論要有效得多，也來得實在得多。現場的、可感可觀的鬥爭經驗給人強烈、直接的衝擊，帶來一種集體情感的認同。美學家朱光潛在其土改總結中記載說^㉒：

鬥爭大會的場面是一種情感教育。在這種場面，任何人都要感覺到心像浪一樣，要經過幾起幾伏的情感的激動。我分析我每次當場的情感，可以毫不慚愧地說，我是站在貧苦農民方面，把地主階級當作對面的敵人來仇恨。我聽到農民對地主訴苦說理，說到聲淚俱下時，自己好像變成了那個訴苦的農民，真恨不得上前打那地主一下。

作家宋雲彬也讚嘆土改的教育意義是個奇迹，而這個奇迹通過群眾遊行的方式表現出來；農民只要經過深入的教育，他們是完全可以接受並且自覺按照人民政府的法令辦事的^㉓。土改期間，全國不同階層、年齡和教育背景的知識份子，寫下了難以計數的土改工作報告和工作總結，訴說自己的感觸和從中得到教育、感悟和啟發^㉔。1950到1952年間的《光明日報》、《人民日報》、《新觀察》、《新建設》等報紙和期刊都陸續刊登了知識份子參加土改的見聞、報告和思想總結。而且，當時全國官方的廣播電台等媒體也大量播報了知識份子讚揚土改的報導。

如果我們排列這些官方文獻，就會發現對於地主封建壓迫的幾乎異口同聲的仇恨，對土改正義性的幾乎異口同聲的讚揚。其中有多少出自真心，有多少是應付時勢的「過關」之作，實在難以詳細分辨，「階級鬥爭」理論多大程度上內化為知識份子心中的準則也難以明確判斷。但是，異常豐富的頌歌和眾口一詞的讚揚卻揭示出一個很微妙的現象，那就是土改過程中，知識份子

本來是個「大罪」，但是因其「階級出身」的「不夠檔次」，轉眼就改變了罪狀的性質，一場桃色事件上升到階級鬥爭高度，而後因為理論上的破綻終歸不了了之。人們生動而巧妙地運用革命理論，在各種空檔中左右突圍，製造一個又一個意想不到的「事件」。土改的階級分析話語，不單是政治鬥爭的武器，也是政治劇場的台詞，人們對這些台詞的闡釋和利用，改變了嚴肅的階級鬥爭的走向，把殘酷的政治轉化成了一場巧妙的展示和婉轉的表演。

這種戲劇性有時為現實蒙上了一層魔幻色彩。張愛玲在以土改為背景的小說《秧歌》裏就描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個上海邊上的村落，裏面發生了饑饉、暴動、搶糧食、燒糧倉，被派到這個農村參加土改、體驗生活，為社會主義土改作宣傳的作家顧岡，看到這裏的人一日三餐都是一鍋稀薄的米湯，裏面浮着切成一寸來長的一段段草，報紙上從來沒有提過一個字，說這一帶地方或是國內的任何地方發生了饑饉。顧岡就像是跳出了時間與空間，生活在一個不存在的地方。他非常清楚上級派他來是要歌頌土改，要寫鄉村偉大歷史變革，人民歡欣鼓舞和積極熱情。他就在這樣的荒誕和幻覺中，臆造一個不存在的水壩故事，寫村民如何熱火朝天興修水壩³⁸。張愛玲以現實為藍本，敏銳捕捉到時代的政治特點，她的小說更像是政治寓言，現實政治事件、顧岡的存在、顧岡製造出來的水壩故事，共同塑造了當時的政治特徵，那就是一種特有的戲劇精神和公共迷狂。

四 討論：走向表演的知識份子

無論是中共派遣到江南的知識份子鍛煉隊、知識份子文工團，或是北京、上海等各個大學的教授和學生組成的特殊土改工作團，都寫出了大量讚揚土改的報告，中國的知識精英似乎一夜之間受到了神迹感召一樣，虔誠地支持共產黨。面對這些令人困惑的報告，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中國問題專家施特勞斯 (Julia Strauss) 評論道，儘管不可能知道這些高等學術界人士是否真的相信他們所寫的參加江南土改的調查學習評論報告，但是其內容已經很好地說明了早在 1951 年中期，這些高級知識份子看上去已經內化了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範疇，並且認同國家政權推動的將成為一場血腥運動的道德必要性³⁹。在極權主義國家分析框架中，施特勞斯依據文本，輕易地推論出知識份子認同階級分析範疇，並支持國家的暴力運動。無獨有偶，黃宗智在對中國農村階級鬥爭的研究中，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他認為知識份子自願參加農村的社會革命，並接受了官方的階級表達結構⁴⁰。

這些討論都沒有擺脫中共建立的黨國體制屬極權主義的認識，並且隱含了國家與社會二元分立的基礎假設，認為知識份子作為社會力量代表，屈從於國家權力。本文研究土改中的知識份子，正是試圖跳出這樣的模式。通過田野訪談和文本材料的梳理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知識份子介入土改的心態十分複雜：有解救窮困的正義想像，有的只是履行政序，有人當作晉升和謀生階梯，有人卻看作救贖原罪的機會……每個人在自己的舞台上，扮演不同

角色。他們完成了政策宣傳、動員訴苦、召開農會、分配土地等具體工作，並且撰寫文字向社會宣傳土改，共同演繹了一場政治儀式。知識份子很少談到直接暴力，即使在田野訪談中，暴力問題也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對劉玉芬和她的朋友而言，暴力是權力展示和正義表演的一部分，這在馮友蘭和朱光潛等人的文本中也得到佐證。知識份子公開發表的一系列文字，是土改儀式的一部分，重要的不是他們內心想甚麼、認同甚麼，核心的是表達甚麼和如何表達。文本存在的意義，更多是作為一種公共符號，知識份子構建了一種特有的公共想像，文本是正義秩序的象徵性表達，他們的實踐和文本成為政治表演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政治儀式的有效利用，也成為政權鞏固的一個重要保障^①。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知識份子構建了「黨國」，也構建了一種獨特的政治體制類型。

在格爾茲那裏，十九世紀巴厘的公共戲劇精神是為了展示社會不平等和等級秩序，是尊貴統治者的地位炫耀；劇場和儀式是統治的方式^②。新中國的政治倫理和意識形態也走向了公共展示，它通過表演來進行教化，通過符號展示來達致集體想像，以這種特殊統治模式來整合紛爭混亂的社會。本文所觀察的知識份子都是這種戲劇精神的一部分。知識份子雖然不是總導演，卻也是劇本重要的編纂者、修訂者，也是公共儀式的主要演員、政治表演的主要觀眾。意識形態作為公共文化和國家的精神支撐，並不具有很大的強制性，反而演變成符號展示和公共表演。

1949年以後，知識份子的表演成為一種潮流，這場關於人生意義的解說清晰的，同時也是模糊的，在感性和理性之間、自覺和不自覺之間、有意識和無意識之間、認同與懷疑之間，存在太多曖昧不明的地帶。這些展示和表演帶有太多情緒，包含了熱誠讚美、真摯頌揚、心悅誠服的認可，小心翼翼的自保、勾心鬥角的權謀、向上攀爬的野心，但更多的是一種瀟灑在一切之上、宿命般的悲涼氣息，也正因此，本文才冠以「無奈」二字。

註釋

① 鄭有貴、董彥彬、焦紅坡：〈土地改革研究綜述〉，《中共黨史研究》，2000年第6期，頁93-97。

②④ 黃宗智：〈中國革命中的農村階級鬥爭——從土改到文革時期的表達性現實與客觀性現實〉，載黃宗智主編：《中國鄉村研究》，第二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頁66-95；83。

③ 張小軍：〈陽村土改中的階級劃分與象徵資本〉，載《中國鄉村研究》，第二輯，頁96-132。

④ 例如高王凌、劉洋：〈土改的極端化〉，《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9年2月號，頁36-47；Julia Strauss, "Rethinking Land Reform and Regime Consolid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ase of Jiangnan 1950-1952", in *Rethinking China in the 1950s*, ed. Mechthild Leutner (Münster, Lit: Berliner China-Hefte, 2007), 24-34。

⑤ 列維-施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著，王志明譯：《憂鬱的熱帶》（北京：三聯書店，2000），頁44。

- ⑥ 關於以口述歷史來研究當代中國革命中的下層民眾聲音的著作，參見郭于華：《傾聽底層：我們如何講述苦難》（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受苦人的講述——驢村歷史與一種文明的邏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
- ⑦ 筆者與劉玉芬的訪談，北京，2008年11月19日。本文所引訪談中的人物均為化名。
- ⑧ 毛澤東：〈不要四面出擊〉（1950年6月6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259。
- ⑨⑩⑪⑫⑬⑭⑮ 筆者與劉玉芬的訪談，北京，2008年11月19日。
- ⑯ 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編，謝亮生等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革命的中國的興起（1949-1965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頁86。
- ⑰ 特納（Victor W. Turner）著，劉珩、石毅譯：《戲劇、場景及隱喻：人類社會的象徵性行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 ⑱⑲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頁19；160；162。
- ⑳ 關於復旦大學師生參加安徽的土改，參見吳中杰：《復旦往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4-6。筆者對復旦1951年中文系學生古小娟的訪談也提及了同樣的歷史過程。筆者與古小娟的訪談，北京，2008年11月19日。
- ㉑㉒㉓ 葛劍雄編：《譚其驤日記》（上海：文匯出版社，1998），頁2-3；362；371。
- ㉔ 筆者與古小娟的訪談，北京，2008年11月19日。
- ㉕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六卷（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頁663。
- ㉖ 筆者與蔡恩勝的訪談，陝西，2011年7月23日。
- ㉗ 筆者與尤恩的訪談，陝西，2011年8月11日。
- ㉘ 野夫：《鄉關何處：故鄉·故人·故事》（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頁3。
- ㉙㉚ 格爾茲（Clifford Geertz）著，趙丙祥譯：《尼加拉：十九世紀巴厘劇場國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124；13。
- ㉛ 蔡仲德：《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頁354-55。
- ㉜ 馮友蘭：《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聯書店，1989），頁119。
- ㉝ 施文淇：〈我所見到的蘇南土地改革運動〉，《新觀察》，1951年4月10日。
- ㉞ 吳景超：〈參加土地改革的心得〉，《光明日報》，1951年3月28日。
- ㉟ 朱光潛：〈從土地改革中我明白了階級立場〉，《光明日報》，1951年4月13日。
- ㊱ 宋雲彬：〈西湖農民的春天〉，《新觀察》，1951年4月10日。
- ㊲ 比如，《重慶市郊區土地改革參觀團工作報告》（重慶：西南人民出版社，1951）；吳景超等：《土地改革與思想改造》（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51）；皖北文教社編：《土改與思想改造》（合肥：皖北文教社，1951）。
- ㊳ 吳中杰：《復旦往事》，頁6。
- ㊴ 參見張愛玲：《秧歌》（大連：大連出版社，1996）。張愛玲經歷了建國初期的土改，流亡香港之後開始創作的這篇小說，以當時正在中國大陸如火如荼展開的土改為藍本。這篇小說長期在中國大陸遭到查禁，1990年代之後開始稍有鬆動。
- ㊵ Julia Strauss, "Rethinking Land Reform and Regime Consolid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6.
- ㊶ 儀式在政治生活中始終扮演一個重要角色，柯澤（David I. Kertzer）指出，所有政治團體的成功，無論是保守主義還是激進革命主義，都離不開對於儀式的有效利用。參見David I. Kertzer, *Ritual, Politics, and Pow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1-10。